

同文馆·历史学经典教材译丛

史学导论

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

[英] 约翰·托什(John Tosh) 著
吴英译



*The Pursuit of
Histo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史学导论

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

The Pursuit of History

[英] 约翰·托什(John Tosh) 著
吴英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028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英)托什著;吴英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同文馆·历史学经典教材译丛)

ISBN 978-7-301-11537-4

I. 史… II. ①托…②吴… III. 史学-研究 IV. 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4126 号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84, 1991, 1999, 2002, 2006.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Pursuit of History, the Fourth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书 名: 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

著作责任者: [英]约翰·托什 著 吴英 译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537-4/K·046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1 印张 420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约翰·托什 (John Tosh) , 英国萨里-罗汉普顿大学 (University of Surrey Roehampton) 历史学教授, 主要著作有 *Manliness And Masculin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Essays On Gender, Family And Empire*; *Historians On History: An Anthology* 等。



历史学经典教材译丛（首批书目）

《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

〔英〕约翰·托什

《西方史学史》

〔美〕恩斯特·布莱萨赫

《世界史》

〔美〕威廉·麦克尼尔

《西欧中世纪史》

〔美〕布莱恩·蒂尔尼 悉尼·佩因特

《西方文明简史》

〔美〕杰克逊·斯皮瓦格尔

责任编辑 / 张 晗

装帧设计 / 奇文云海 
www.qwyh.com

第四版序言

在这一版中,正文的主要内容未变。补充材料附在页边与每章的开始和结尾处以方便学生参考。非常感谢希安·朗编写了这些材料。

约翰·托什
2005年8月

修订第三版序言

本书属于历史学概论类的著作，这种类型的著述始于卡尔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是什么?》(E. H. Carr, *What is history?*)。为纪念《历史是什么?》一书出版40周年，出版商在2001年重新发行了该书，并附加上卡尔为第二版做的注释和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写的新导言。^[1]《历史是什么?》一直在市面上销售，从它首次出版以来就是学生阅读书目中一本可信赖的读本。它按经典著作编辑版式重新发行反映了历史学目前的地位。

从某些方面看，《历史是什么?》的持续流行是令人惊讶的。卡尔是从一种间接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专业的。他未受过历史学的系统训练，也从未教过历史课；只是在生命较晚的时候，才开始专心从事历史著述(撰写他多卷本的《苏维埃俄国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他更多地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权威而闻名。《历史是什么?》最初是卡尔在剑桥大学历史系进行的一系列演讲的讲稿。这是一部引发巨大争议的著作。考虑到卡尔作为局外人的身份，书名颇有点挑衅意味。尽管他表现出对过往伟大历史学家的尊重，但他对该专业目前的研究人员表现出了轻蔑态度。这本书还打下了政治背景的烙印，那似乎是一个大大不同于今天的世界。它是在冷战背景下写作的，尽管那一刻两大权力阵营和解的前景相比许多年来更光明些。卡尔自身非常同情苏联，尤其是它的统治精英；他还相信亚非广大地区独立的实现，代表了人类进步迈出的巨大一步。简而言之，这本书深受作者所处时空背景的影响。

《历史是什么?》由此并未被证明是指导未来历史研究的一部宪章就不令人奇怪了。卡尔集中关注的一些论题在今天已经很少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他对社会和个人论题的论述似乎是遥远过去的话语，他有关历史客观性的解释也有些不合时宜。反之，今天历史研究的许多特色论题在这本书中甚至连提都未提

到。卡尔认为,历史学是学者和权力精英的专属领域。在任何意义上,无产者和边缘群体都无权建构他们自身的历史学,由此也就无法预见后来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出现。也许可以有把握地说,卡尔将被性史研究的出现所震惊,并为口述史的出现而感到沮丧。他首先会被后现代主义的攻击激怒。尽管持怀疑态度,但卡尔并不否定文本证据的历史真实性,他的历史观奠基于有关进步和权力的“宏大叙事”。这两者都是解构主义者攻击的靶子。

《历史是什么?》为人们持续关注的原因基于两个方面。第一,它事实上确立了一种新类型的研究。自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人们就在探索有关历史性质的问题,但它们几乎都是由哲学家提出(和回答)的。确实,这种研究的发展史能够在几乎不提及历史学家的前提下令人信服地写出来。^[2]历史学家很少会离开他们从事的具体历史研究,他们也许会写作有关研究方法的指南,但却不会对历史学的性质做出反思。卡尔克服了这种缺陷。他对哲学非常熟识;同时,他也是历史研究的充分实践者,这使他的分析植根于对实际问题的历史研究中。两者的结合就是这样一部著作的诞生,它有力地把握住了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中未言明的假设,并对它们进行了彻底批判。同时,这本书的批判性基调本身就激发了各种批判性反应,因为它的一些论点被论辩式的写作方式所扭曲。在仿效《历史是什么?》的各种著述中,这种破除旧论的特性并不是非常明显,但1961年明显成为历史学著述演变中的一个分水岭。卡尔提出的问题塑造了一种历史研究的学术氛围。他的各种观点不可能被忽略。它们成为一系列历史学家——埃尔顿(G. R. Elton)、阿瑟·马维克(Arthur Marwick)、戈登·康奈尔-史密斯(Gordon Connell-Smith)、H. A. 洛伊德(H. A. Lloyd)等等——激烈争论的对象。^[3]更近的作者——例如柳德米拉·加尔丹诺娃(Ludmilla Jordanova)^[4]——也许很少会明确提及卡尔,但首次由《历史是什么?》开创的研究仍然占据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卡尔的著作产生持久反响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这本书传达的最明确和最紧迫的信息仍然具有很大的适用性。卡尔指出,历史是一种过去和现在之间不断的对话。

根据过去了解现在也意味着根据现在去了解过去。历史学的功能就是通过了解两者间的相互关系获得对过去和

现在的更深刻理解。^[5]

卡尔强调的结论,即历史研究的问题和结论必然随时间而变化,从逻辑上说,紧接着上面这一前提。这种论点部分是针对浅薄的经验主义提出的,而这种经验主义在那时的历史学家中比现在更为流行。卡尔想去除这样一种想法,即遵从可靠的专业研究程序将产生有关过去的可信的或客观的知识。他揭示出,在历史研究的所有层面上现实都会影响对过去的重构,从原始资料的选择一直到历史学的最终著述都是如此。最漫不经心的读者也会从阅读《历史是什么?》中获得这种认识,即历史学家无法置身于历史之外;一些历史学家相比其他历史学家更能超越他们作为当代人的先入之见,但即使是最客观的历史学家本质上仍然是当代人的一分子。

由于历史专业在历史研究论题上局限于非常狭隘的观念,因此卡尔的观点确实具有创新性,可以预见它将引起强烈反应,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历史是什么?》出版后不久,很快就形成了一些新的历史学流派,这很难说是偶然的。这些流派着力去从事有现实需求的历史研究:例如,以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新城市史学派和非洲史研究。就好像是卡尔有关过去和现在之间有着动态关系的观点在较年轻的史学家中激发起了新的创造能量。在这种意义上,今天历史学的理论形态无可置疑地受到了卡尔的影响。历史学继续保持高度多样性的特征——无论是在研究论题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肯定是它健康发展的标志,正如不断有作品出现来批判由卡尔创建的历史研究传统一样。^[6]

同时,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对广大公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公众的反响各式各样。2000年1月第三个千禧年的来临提供了一种便捷的视角,来评估目前历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在这种时间的里程碑上,既要过去做出评估,又要对未来做出规划: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因为对未来的任何观念都是参照过去界定的(正如卡尔所强调的)。例如,人们也许希望对自罗马占领之后1000年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做一些反思,或根据有关连续和变化的长时段观点来重新评估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但是,英国公众对新千年的庆祝却几乎没有历史内涵:庆祝的基调是由在格林威治的千禧穹顶举办的展览会设定的,在展览会上有关人类经验和成就的各种主旨展题都是

在一种历史真空中予以表现的。历史学家在为这个庆祝进行规划上似乎并未发挥什么作用。

在 21 世纪迄今为止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发生时,人们被证明不可思议地缺乏历史的视角,因而是与这种千禧年的基调相一致的:那个事件就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灾难,大多数美国人和他们的许多海外朋友被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心理上的憎恶感和复仇的愿望所支配。这些反应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构成制订合理反恐政策的基础。9 月 11 日是一个重要的时点,在此有许多历史线索交汇在一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与讨伐异教徒或圣战的观念相联系);巴勒斯坦内部积蓄的危机;许多伊斯兰国家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中东对美国干涉主义不断增加的仇恨;以及自冷战结束以来不稳定的世界秩序。^[7]对这些线索的分析性思考,不仅要求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而且要求客观公正的冷静头脑;它可能首先是某种情势下的因果律,但大多数人却是带着恐慌和愤怒的情绪来认识它的。在“9·11”事件之后的世界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迅速使美国的政策制订受一种历史感支配。

不过,历史意识的丧失并非仅是陷入灾难的国家面临的问题。当前,英国政府就明显抵制任何来源于历史的批判性观点。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的保守党政府有着一种民族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不同场合被援引以反对欧洲的一体化,反对权利在联合王国内的移交,以及在其他问题上发挥作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鼓励政府将自身和维多利亚时期先辈取得的成就进行比较,她的那届政府在国家课程设置上相比其他科目也更关注历史学。1997 年布莱尔上台标志着一种显著的变化。确实名副其实,新工党摆出致力于创新的姿态,要卸下历史的重负。2001 年工党成立 100 周年未被认真对待,就好像回顾历史会唤起有关它早期激进主义的记忆,而由此危害它的新生一样。布莱尔很少在公共场合提及历史的作用,即使偶尔提及也往往是否定性的:例如在达成有关北爱尔兰问题的《耶稣受难日协议》(The Good Day Agreement)的谈判中,他表达了能够放下历史包袱的希望。^[8]新工党肯定是将历史视为可以轻易抛弃的文化资源。由保守党在全国课程设置中为历史学安排的位置被降格,以适应更为紧迫的要求,诸如公民教育。在让渡出历史学领域后,布莱尔是否已将有效的文化资源交给他的竞争对手

仍需拭目以待,由此造成的损失也许会令他终生遗憾。

与政府高层盛行的漠视历史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很多文化机构鼓励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它们中的许多机构出于这一目标而接受公众资助:人们也许会想到大型的国家博物馆、由英国遗产协会(English Heritage)维护的历史纪念碑和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是一个被称为“公共史学”的领域,意指以公众为阅读对象而撰写的历史,当前它无疑处于迅速发展的状态。博物馆的游客数量最近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取消门票收费的决定仅是部分原因。历史目前在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传媒——电视——中占据重要位置。相比从前,有了更多历史类节目被推出,以至有人戏称历史学是新的受人们追捧的“园艺学”。热门主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英国君主政治史,历史类节目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它们都在尽力将历史带进生活,并引发某种历史认同感。

xii

当然,大众文化的许多表现形式受到商业因素的影响。例如,人们能够反驳说,博物馆和古代纪念碑之所以受到公众欢迎主要不是由于它们对广义历史教育的贡献,更多地是因为它们是旅游业的组成部分;因此对“遗产”一词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公共史学在政治影响方面的假设也值得怀疑:在娱乐的表象下,公众的历史印象往往是对历史的感伤、怀旧和民族自豪感。^[9]但这两种批判都是不切题的,因为它们夸大了公共史学卫护者的作品对公众的影响能力。有关当前历史素材在旅游线路或传媒中流行的重要结论乃是,它反映了各种形式的想要超越否定历史作用的陈旧思想的倾向。个人的寻根意识、就当前文化认同达成共识的需要、更好地把握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都塑造了公众对历史的偏爱。对历史的偏爱不仅通过在公共领域中运用历史素材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在创造性的个人诉求上,诸如研究家庭史和收集特定类型或场合的老照片。^[10]

大多数历史学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对历史的通俗运用,相信它们已经偏离了重构和解释历史的真正任务。但专业和通俗的偏好并非是彼此排斥的。在某些与政治或文化利害攸关的论题上,细致的学术研究被视为是最终的仲裁者。最明显适用的论题是大屠杀。欧洲犹太人的社会记忆、德国的道德责任和以色列国的合法性都与这一事件紧密相关联。真是有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丧生了吗?希特勒设计并执行了对他们的灭绝行动了吗?或者,大屠杀难道不是一种神话宣传吗?它是否是由

xiii

战胜国在战争结束时设计出来的呢?这些问题在 2000 年英国独特的背景下被人们审视。一位权威的修正主义史学家大卫·厄文(David Irving)宣称,美国学者戴博拉·利普斯塔德(Deborah Lipstadt)和她的出版商企鹅图书公司诽谤他,将他描述为“大屠杀论的否定者”,说他隐瞒和歪曲了客观的纪录。为了驳斥这些指责,抗辩方既需要证明厄文在证据使用上是不诚实的,又需证明他所否定的历史事件确实发生了。结果,专业历史学家的观点成为这项诉讼的中心所在,它们将成为法律审议的论据。几位权威学者或者在法庭上作证、或者被委托在这些重要历史问题上出具报告。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被专门聘请调查厄文研究程序的有效性。在后来有关这一诉讼的报告中,埃文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一位历史学家在说实话时,我们如何才能知晓?”^[11]答案就是,通过追溯他或她的陈述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即可判明。在 3 个月间,法庭审理了大量此类证据。依据 350 页鉴定材料提交的裁决明确判定厄文败诉:他被查明蔑视公认的研究方法,操纵证据来适应他的政治偏见。

厄文诉讼案在减少大屠杀否定论的可信性上明显是重要的。但它还有更广泛的意义。它表明,专业历史学家确实是重要的,过去一些事件能够被证明是真实的,由此排除合理的怀疑,社会在维护学术规范上也有着既得利益。所有这些命题都是近年来争论的问题。历史学被现代主义者贬斥为与现实无关的古史研究;被后现代主义者贬斥为追求私利的虚构。历史学家有时会感到,他们专业的学术主张在与来自外部的怀疑性见解的争辩中经常会处于下风。厄文的案例也许会被证明是唯一性的:也许其他历史问题不可能导致在学术研究和政治宣传间产生如此尖锐和明确的对峙。但它仍然合理地提示我们,尽可能进行最准确的历史研究是社会所必需的。

简言之,这些就是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立场。本书首先要在导向性历史观和技术性历史观之间做出区分。它的结论是:只要承认与现实相关的历史研究的有效性,历史学家将会继续赢得所在社会的支持。其间各章通过界定历史学科的证据基础、通过提出它具有自身特色的论题(它们经常来源于现实问题)、通过厘清客观可信知识的局限性等,来支持本书的各种立论。尽管迷恋于现代和新颖,但当代社会仍然将过去视为获得合法性和激励的一种源泉。很容易对完全关注于过去和完全以现实为中心的这两种极端相对主义做出批判。厄文的例子提示我们,有一些

重要的历史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化政治学的范畴，而将历史学的专业技能置于优先的地位。只要上述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本书所描述的研究技能和结论就将是社会所需要的。

约翰·托什

2002年4月

E. H. 卡尔和他的生活背景

《历史是什么?》出版于1961年，此时年轻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0年当选美国总统使人们产生了希望，即东西方冷战的紧张关系也许会有所松动。事实上，肯尼迪1961年在维也纳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不成功会谈表明，东西方的分歧仍是如此的深刻。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双方处于爆发全面核战争的危险边缘。英国统治地区的长期非殖民化进程始于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和独立，并在1961年卡尔著书立说之前迅速加快了步伐。加纳在1957年赢得独立，1960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警告南非白人一场变革风暴正在席卷非洲大陆。到1968年，英国已经自愿从它所有的非洲属地上撤离——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除外，后者在1963年宣布独立。

xv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在文学理论和历史学领域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想运动。它强调历史学家作为历史著述和解释者的角色的重要性、强调用于传达历史学家思想的语言的重要性，因为历史学无法独立于历史学家而存在，由此对历史学能够提供任何种类客观真理的能力提出质疑。对后现代主义更充分的讨论将在第七章中进行。

千禧穹顶

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计划在2000年1月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展览来庆祝第三个千禧年，这次展览主要是歌颂人类取得的成就，它将在格林威治专门建造的一个穹顶中进行。这次展览的目的和质量遭到公众普遍的讥讽，该工程的不良管理

和急剧上升的成本增加了公众的不满。在千禧之夜,专门为该展览服务的公共交通也恰好未能正常运转。“穹顶”成为华而不实的风格、缺乏实质内容和管理不力的代名词。

“9·11”事件及其背景

在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的命令下,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劫机者控制了4架美国国内航班的飞机,蓄意撞向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美军司令部)和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楼。这些攻击行为刺激了美国的民意,当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要进行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时,他赢得了公众的普遍支持。这些攻击行为部分源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期、持续的冲突,冲突的根由在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殖民造成的紧张关系。在21世纪初巴勒斯坦发起了一次普遍的起义反对以色列的统治,最初是通过街头抗议的形式,但后来越来越多地通过自杀式爆炸的形式。以色列将这些攻击与布什总统在9月11日后宣布的普遍反恐战争联系在一起,但没有一套解决该地区问题的政治方案,暴力将不会被制止,这是非常明显的。

耶稣受难日协议

一项英国和爱尔兰政府于1988年耶稣受难日签署的政治协议。该协议被普遍认为终止了在北爱尔兰长期存在的暴力冲突、启动了北爱和平进程。

第三版序言

在日常用语中，“历史”一词包含两种意义。它既指在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那种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本书是为第二种意义的历史撰写的导论。它是为所有那些对该学科有着充分兴趣的人撰写的，他们想了解历史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它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更具体地说，本书是写给那些研修历史学学位课程的学生们的，对他们而言，这些问题具有特别的适用性。

传统上，学习历史的大学生并未就他们所学科目的特性接受正式的指导。历史在我们文明发展过程中长期发挥的作用和它非专业性的表述形式都表明，仅凭常识以及一般性教育将无法提供学生需要的导向性历史观。传统做法给偶然性留下了很大空间。让学生们对他们将要花三年或更多时间学习的学科所能发挥的各种功能有大致的了解，确实是必要的。相比 20 年前，现在选课是一件更令学生困惑的事情，除非是让他们对当前历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明晰的把握，选课更多地是碰巧而为之。首先，学生们需要了解原始资料的特性对历史知识的各种限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这样他们就能在早期阶段接受一种批判性的方法，以慎重对待那些被要求掌握的、大量根据二手资料创作的著述。但是，几代学生很可能都是在没有有关这些问题的系统知识训练的前提下完成历史学学位课程的。但现在大多数大学已经认识到，历史研究的价值会由此而减少，为此要提供有关历史学研究方法和范围的导论性课程。我希望本书将能满足那些选修了这样一门课程的学生们的需要。

xviii

我自身的研究领域是非洲史和现代英国性别史，撰写一部有关“新史学”的宣言并非我的初衷。我只是将努力表明目前历史研究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将最近的创新置于主流传统学术研究的背景下予以考察，并会不断介绍许多第一流的历史著述，而这些将是我的教学大纲的主要内容。历史研究的范围在今天是

如此广泛,以致很难确定本书的准确范围;但没有一些或多或少硬性划定的界限,这样篇幅的一部导论性著作会失去它的逻辑一致性。因此,我不会谈及科学史,也很少论及艺术史或环境史。我所涉及的历史资料实际上局限于语言资料(书面的和口述的),因为这一领域是历史学家宣称具有特殊专业能力的领域。一般而言,我将选择局限于被今天的学者广泛研究的课题上,以区别于那些有可能在未来被广泛讨论的研究方向。

不过,即使有了这些限制,我所涉足的领域仍然是充满争议的。任何设想一本历史研究导论将能够列举出一些获得认同的历史观点的人肯定会立即被驳斥。历史学专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在历史研究目标及其局限性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本书肯定要反映我自己的观点,一开始就对此做出声明是恰当的。重要的论点包括:历史学是具有社会实践性的学科;其功能的适当发挥取决于对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包容和鉴别的态度;不管它的灵感来源是什么,所有历史研究都必须根据严格的批判方法进行,这种方法是现代学术历史研究的标志。同时,我也努力将这些主张——当然它们都不是原创性的——置于历史学家最近争论的背景下来表述,使那些我不同意的观点也得到公正的体现。

xix

本书意在探究一系列有关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一般性命题,而不是提供进入某一领域或专业的入门性建议。但既然我希望大多数读者能够更熟悉英国史,所以我的例证材料大多集中于该领域,其他一些例子来自非洲、欧洲和美国。本书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但其中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的交叉引用,以便于那些仅希望了解一个论题的读者使用。

第三版对文本做出了实质性修订。历史研究所处的学术氛围自1984年以来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有关历史研究地位的长期争论更加尖锐。在第七章中,我将充分考察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抵制它的更具破坏性的倾向。新的“有关意义的各种理论”的一章将评估历史学中文化转向的趋势,包括性别史研究中的文化倾向。新版书首先更充分地说明学术历史研究是如何不同于其他有关历史的解释,这导致在第二章中对历史学的社会意义的扩展研究。在其他章节中,我在许多处都对文本做出了修正和更新。

由于本书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所以本书更多地依赖其他学者的帮助。最新的版本得益于米切尔·平洛克(Michael Pinnock)、米切尔·罗帕(Michael Roper)和已故的

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的建议。我希望文本仍然保留着受到众多学者影响的印记,他们对较早期的版本提出了批评性建议,尤其是诺玛·克拉克(Norma Clarke)、本·福克斯(Ben Fowkes)、大卫·海尼格(David Henige)、蒂姆·希特考克(Tim Hitchcock)和已故的彼得·塞尔特曼(Peter Seltman)。多年来,北伦敦大学提供了慷慨的资助,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教学环境,使本书的思想得到发展。本书所奉献给两个人尼克·托什(Nick Tosh)和威廉·托什(William Tosh)一直牵挂着本书的命运。在修订的最后阶段,卡罗琳·怀特(Caroline White)给予了我及时的鼓励和许多别的帮助。

约翰·托什

1999年3月于伦敦

xx

注 释

- [1]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J. Evans (Palgrave, 2001).
- [2] See for example B. A. Haddock,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Thought* (Arnold, 1980).
- [3] G. 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Fontana, 1969);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Macmillan, 1970); Gordon Connell-Smith and Howell A. Lloyd, *The Relevance of History* (Heinemann, 1972).
- [4] Ludmilla Jordanova, *History in Practice* (Arnold, 2000).
- [5] Carr, *What Is History?*, p. 62.
- [6] See for example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Granta, 1997); Ludmilla Jordanova, *History in Practice* (Arnold, 2000);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Routledge, 1997). For a recent anthology, see John Tosh (ed.), *Historians On History* (Longman, 2000).
- [7] For a preliminary analysis, see Fred Halliday, *Two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Saqi Books, 2002).
- [8] Tony Blair, quoted in *The Guardian*, 11 April 1998.
- [9] Patrick Wright,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the National Pas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Verso, 1985).
- [10] For a passionate demonstration of this point, see Raphael Samuel, *Theatres of Memory*, vol. I (Verso, 1994).
- [11] Richard J. Evans, *Telling Lies About Hitler: History, Holocaust,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Basic Books, 2001), p. 1.

xxi